

中国

哲学

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I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人民出版社

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

平飞著

——《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本书获得南昌航空大学科技成果专项基金与
学科创新团队建设经费资助

JINGDIAN JIESHI YU WENHUA CHUANGXI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I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经典 解释 与 文化 创新

平·飞 著

——《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平飞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ISBN 978-7-01-008194-6

I. 经… II. 平… III. ①公羊传-研究②经籍-解释-研究

IV. K225.04 Z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8045 号

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

JINGDIAN JIESHI YU WENHUA CHUANGXIN

——《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平 飞 著

人 民 *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4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194-6 定价:2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世纪之交，我们站在时代的入口，亟待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并深感任重道远；而重新阐释和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世界，促使其精神的现代转生，是现代性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正有志于这一文化精神的担当，精心筛选了一批在中国哲学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优秀著作。在这里，聚集着一批活跃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他们贵于创新，展现和昭示着未来。我们希冀本文库的出版，有助于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新的开掘，从中发现一片新的精神世界；我们也诚邀更多的博士俊杰加入到我们的文库行列，祈盼庶几能推出一批学术新人。

《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 历史文化价值(代序)

李宗桂

《春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经典,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构建者和承载者之一。阐释《春秋》的重要著作是“《春秋》三传”,亦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三传各有特色,而以《公羊传》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为大。之所以如此,与《公羊传》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影响密不可分。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扰攘甚多。关于作者,班固认为是公羊子,戴宏认为是公羊寿和胡毋子都,颜师古认为是公羊高,还有认为作者名并不可知,或者是别人名字如卜商或孔商讹传之异名,等等。据我对相关文献研读后的体会,认为《公羊传》的作者当是公羊氏,口头创作传授者是公羊高(班固所说的公羊子即是公羊高);“著于竹帛”亦即写成文字者是公羊寿。《春秋》三传中,《左传》因左丘明而得名,《穀梁传》因穀梁赤而得名,因此,《公羊传》因公羊氏而得名,应是正常而合理现象。《春秋》三传都因人而名,协调而自然。公羊高是战国时人,公羊寿是西汉景帝时人,可见《公羊传》从口说到形成文字定本,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也说明文本创制特别是思想创造的不易。

《春秋》三传中,就其对经典的阐释路径和特点而言,《左传》

《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代序)

长于事,以事解经;《公羊》长于义,以义解经;《穀梁》义、事兼顾而偏于义。按照传统经学的分派,《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公羊》、《穀梁》属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重视史实的阐明,今文经学钟情大义微言的发挥。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考察,从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审视,《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史料表明,汉文帝开始设置经学博士,但该经仅是《诗经》而已。景帝时设置《春秋》博士,董仲舒便是其一。武帝时,设置五经博士,其《春秋》经博士只有《公羊传》一家,《左传》、《穀梁传》此时并未列于学官。史载:“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汉书·儒林传赞》)可见,《公羊传》在景武时期的地位十分显赫。这个史实,本身就表明了三传中《公羊传》的独特价值。崇尚事功的武帝,其一切政略都是为了巩固发展刘汉王朝的基业,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现实需要,以及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目标,而不尚虚饰,故而特别重视《公羊传》。武帝时,第一个以儒生身份登上相位的,是传《公羊》的公孙弘;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更是三次就治国安邦、长治久安之道对策于武帝,其一系列思想和建议为武帝采纳,成为政治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董仲舒从公羊家立场所阐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世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清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催迫下,公羊学重兴,成为当时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武器。名动一时的常州学派,从庄存与到刘逢禄,都着力阐发公羊义,为社会变革提供资源。龚自珍、魏源借公羊议政,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张目。康有为撰写了《春秋董氏学》,系统阐发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伸张公羊大义,并撰《孔子改制考》等书,论证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公羊传》之所以能够在汉武帝开创新局、建构新型思想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时期受到重视并发

挥重要作用,能够在清代后期社会危机重重的险境中重新焕发生命,是因为它重视经世致用,崇尚一统,以拨乱反正为归旨,主张进化,追求安康太平。这些,都体现了公羊学思想的正面价值。

《公羊传》之所以能够从传《春秋》的“传”而最终成为一部“经”(“十三经”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它是维护统一的书,是主张变革的书,是倡导走向美好未来的书,是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的书!

《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元典,在经学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尽管汉代以后公羊学一度消沉衰颓,但这并非公羊学本身之过,而是时代使然。当中国社会发展到清代后期,“万马齐喑究可哀”之时,希望国家民族富强安康的仁人志士以“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殷切期盼,寻找救国济民的良方,公羊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被冠以“公羊学派”之名的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是清代变法维新的思想先驱;其后的龚自珍、魏源,进一步光大公羊学,为改制创新提供了新的资源;再后的康有为,更是自觉高举公羊学大旗,重构中国经学史,重释中国传统文化,在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中弘扬了公羊大义。由此可见,《公羊传》在中国经学发展的进程中,往往是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相结合,是经邦济世之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羊传》所蕴涵的深厚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而这种深厚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通过《公羊传》对《春秋》的大义微言的阐释而呈现出来,也通过其对经典的阐释方式而呈现出来。要把握《公羊传》所阐释的经典中的大义微言,要把握《公羊传》解经方式的独到深奥和神妙,就离不开对《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研究。可以说,从方法论意义上讲,没有对《公羊传》“以义解经”方式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理解《公羊传》,不能理解公羊学,不能理解今文经学,从而不能理解贯穿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的经

学,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平飞同志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是他的导师。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公羊传〉“以义解经”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著作《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是从新的文化视角和哲学思维的层面切入,对《公羊传》进行创新性研究的成果。他认为,经典的生命在于经义,经义蕴涵历史生活智慧,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哲学思维的层面探讨《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独特的公羊学派及其精神,乃至整个古代政治文化模式,而且也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独特的经典解释理论及其意义。我认为他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平飞从经、经学、经学思维切入,关注《春秋》文本和春秋学,紧扣《公羊传》和公羊学精神,凸显《公羊传》“以义解经”的问题意识,对《公羊传》解经的动机目的、方法原则、基本义例、精神实质,以及公羊义在两汉政治文化实践中的运用,做了详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公羊传》解经具有尊经、尊圣、尊道的经学情结;《公羊传》非常重视《春秋》书法,认为《春秋》是“书法”、“褒贬”、“大义”的结合体;《公羊传》解经的鲜明特点是索隐特性、批判风格、立法精神、权变意识和经世取向;公羊学精神体现为反思批判精神、制义传道精神、权变发展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公羊传》解经阐发了天人感应观念,为后世公羊家提供了思想资源;等等。平飞这部著作的思考轴心,具体展现为经学思维问题、经典解释问题、政治文化模式问题,这是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平心而论,平飞在书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态度严肃,材料充分,论证严谨,结论合理。国内学术界同行专家给予平飞的博士学位论文高度评价。有的专家指出,平飞的博士论文“紧紧围绕公羊学派‘以义解经’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系

统研究,属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经学研究的前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有助于传统经学思维方式、经典解释学、政治文化模式的澄明与展开,表明作者有深刻的问题意识。”还有专家认为,平飞的博士论文“为学科前沿的开拓性成果,将有助于经学诠释学的建设与发展。视角宽广,新论时见”。有的专家指出:“以义解经是很有深度的课题,……以这一典型展示中国古代解经,为现代解释学提供一种新的模式和实例,有心者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同行专家的这些评价,是对他数年刻苦钻研而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和真诚勉励。

《公羊传》是国学经典“十三经”之一,谈到《公羊传》,免不了要谈谈其与国学经典的关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文献学层面而言,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最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对于“四书”的关注较多,而对“五经”的关注较少;“五经”的研究之中,对于《易》、《诗》、《礼》的关注较多,而对《书》和《春秋》的关注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的难度,以及对于相关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没有到位。当然,《春秋》行文的过于简略和内容的琐碎,也是导致学界相对缺少关注热情的原因之一,尽管王安石讥刺《春秋》为“断乱朝报”未必恰当。实际上,自古以来的《春秋》学,除了三传本身是从《春秋》出发探讨问题,或者说是借《春秋》说事之外,真正关注《春秋》经本身的是少数,往往是通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研究来阐释《春秋》,从而形成了《春秋》学。而《春秋》三传本身并不在传统所谓的“四书”、“五经”范围内,它们属于“十三经”的范畴。这样,“四书”、“五经”和“十三经”合观(其实还应加上《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以及“二十四史”等),才能整体上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载体的面貌。尽管“十三经”已经包

含了“四书”、“五经”的全部内容,但“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这两部对宋以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著作,在“十三经”中并没有单列,而是包含在《礼记》之中,属于《礼记》的部分内容。朱熹的贡献,就在于给《礼记》的《大学》、《中庸》分别作注,并将其单列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本来,这类二加二等于四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根本不是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些年学习、研究国学的热潮不断高涨,良莠并存,真正的国学研究专家从来不知道的“国学大师”比比皆是,而并不知道《大学》、《中庸》本身就是《礼记》内容之一的“国学大师”,不知道《易经》和《易传》是两码事的“易学家”,为了孔方兄而四处“讲学”,信口雌黄,贻误青年,故讲讲这些常识未必无益,也是我对时下不良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的针砭。实际上,由此也可看出,对于经典的解释,需要严肃真诚的态度和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良好功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典解释与文化创造的统一,否则,就只能是曲解经典、摧残文化。

中国传统学术分派,主要是按历史时期或者地域或者性质命名。按照历史时期命名的,如汉学宋学、乾嘉学派之类;按照地域命名的,如濂洛关闽、常州学派之类;按照学派性质分类的,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学派之类。作为今文经学元典的《公羊传》,其形成文字版本是在汉代;作为经学中重要理论体系和派别的公羊学,也形成于汉代(经过从董仲舒到何休的创造性的系统阐发而完成)。按理,如果要以历史时期划分学派,则以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经学属于“汉学”。可是,多少年来,学术界往往“汉”“宋”对举,把汉学说成训诂章句之学,把宋学说成是义理之学。这种说法显然具有很强的片面性。诚然,宋学是义理之学,但汉学并非只有训诂章句之学,而同样有义理之学,今文经学就是义理之学!

《公羊传》“以义解经”，就是典型的义理之学的体现和彰显！实际上，把汉学片面性地说成是训诂辞章之学，就逻辑地把古文经学说成是汉代经学的唯一学派，而把今文经学排斥在汉代经学乃至整个经学发展的历史之外。我不好说这是非愚即诬，但至少是狭隘的学术门户之见而导致。翻检文献，可见所谓汉学宋学之说渊源有自，其代表是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其后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中，阮元在其《国史儒林传序》中，也取此说。其实，他们所说的汉学仅仅是指东汉古文经学，而排斥了西汉今文经学。国内学术界近三十年来不加辨析，沿袭旧说，习以为常，甚至以讹传讹，往往误导社会，误人子弟。据此，我倒是比较赞同经学史大家周予同先生早在1928年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出版时所写序言中的分类，即将经学派别分为三类：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样，内容相对充实，概念相对周延。

公羊学的研究，尽管相对于“十三经”范畴中的《易经》、《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著作的成果而言，要薄弱很多，但这些年毕竟在传统文化热的推动下，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召唤下，在学术研究的拓展性研究渴求下，有了可喜的进步。海峡两岸这些年关于《公羊传》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水准日益提升，令人欣喜。我真诚期盼未来有更多更好的公羊学研究成果问世，真诚祝愿平飞博士的这部著作能够在公羊学研究成果中成为被同行真正认可的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并祝愿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保持奋进精神，取得新的成果。

2009年11月1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自序

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

- ① 《经部总叙》:“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

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经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其中,“五经总义”属于综合性研究;“小学”属于文字训诂研究,《尔雅》一经就是训诂书;“乐经”虽然早佚,但有关“乐”的研究不断;“四书”由宋代理学家朱熹定型,“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属于“十三经”中的“两经”,而《大学》、《中庸》原属《礼记》一经中的两篇;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三经;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经。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01页。

换言之,经学主要以《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十三经为研究对象。

通观诸经,《周易》与《春秋》两经曾被学者称为“怪书”^①。《春秋》一经怪就怪在《春秋》本是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却列为“经学”之中,而且因是否为孔子所作以及如何制作、为何制作而成千古学术公案,至今难以定论。《春秋》三传的解释形成了两个传统,即《左传》“以事解经”与《公羊传》、《穀梁传》“以义解经”,而后者尤以《公羊传》“以义解经”为突出。这两个解释传统各有千秋,三传都与《春秋》经文合并升格为“经”,也成了经典解释的两个独特传统。台湾学者张高评在《关于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有关〈春秋〉经传研究现状》的文章中分析了台湾博硕士论文、学报和期刊论文后指出,目前关于《春秋》经传尚没有仔细研究的题目有140个之多,其中就有“《公羊传》‘以义解经’研究”一题。查阅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发现对此问题也没有过多系统深入的研究。反复思考这个论题,觉得《公羊传》“以义解经”这个文化解释现象本身蕴涵着三个重要的问题,关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深层结构,具有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最重要的莫过于经典负载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历史智慧。但经典只有进入解读者的视野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醒、激活才会从“历史博物馆”转向“活生生的心灵”,重现经典的生命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研读《春秋》与《公羊

①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页。

传》并考察“以义解经”这一文化现象,探索连接作者与读者的经典如何在还原和新生之间产生历史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本身就是语言世界和解释世界中颇有趣的事情。智慧因解释唤起,解释又传递智慧。进入这个语言解释世界,是孔子在说?是《春秋》在说?是《公羊传》在说?是当今研究者在说?还是语言本身在说?这颇耐人寻味。人生在世,无往不在这个独特的语言解释世界当中。在这个语言解释世界中言说,本来就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当自觉这样做的时候,学术活动就是生命活动,研究《公羊传》“以义解经”的学术活动就是进入古今解释世界实现“视阈融合”产生“历史效果”的生命活动。

学术研究往往特别青睐客观研究,因而,对于价值中立与主题先行,前者常常更为提倡。价值中立要求研究者悬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主观先见,对“本来的历史”进行考察,还原历史真面目。“本来的历史”既有客观的历史,也有对客观历史反映的“观念历史”,而“本来的观念历史”考察又成为价值中立研究的首选目标。研究《公羊传》“以义解经”不是为了站在《公羊传》传者以及后来的公羊家的立场去演化延伸,而是力图客观地再现《公羊传》“以义解经”这一解释现象本身以及演变的真实情况。

问题是,作为一个当代研究者,不可能没有其固有的存在视域、历史视野。理性自觉到这一视野或先见,对于客观的价值中立研究是必要的。从解释现象本身而言,首先需要保持对作者、经典、读者及其关系的自觉,尽量不将作者读者化或读者作者化,始终面向经典与作者。其次需要保持对文本语言、私人语言、公共语言及其关系的自觉,防止混淆语言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区别。再次需要保持对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及其关系的自觉,尽量克服三者的分离乖张。又次需要保持对还原思维、散点透视

思维、生成思维及其关系的自觉,尽量进入解释者的思维世界。复次需要保持对解释的立场、方法、原则、目的,解释的客观性、创造性、有效性以及作为方法工具的解释(如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与作为存在方式的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即解释,口说即口头传授——书写如著于竹帛)等的自觉,尽量弄清解释者的内在理路而非外在理路。从解释视阈来看,如果当代研究者的视阈越大,自觉意识越强,就越有可能真正接近历史本身,不管是本来的客观历史还是本来的观念历史。自觉当代研究者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背景、马克思主义知识背景、西方文化知识背景,是防止将古人现代化或今人古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学术界存在的“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以西释中”的解释理念各有优势,需要综合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研究者要真正接近历史,还需要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研究学派或学者的存在视域、历史视野有某种自觉。范围从大到小视点聚焦经学、春秋学、公羊学,考察经、经学、经学思维,包括汉学(经今文经学、经古文经学)、宋学,或经今文经学、齐学、鲁学以了解“经学传统”;考察春秋学、左氏学、公羊学、穀梁学以整体了解“春秋学传统”;考察公羊学精神、公羊学、《公羊传》,包括著于竹帛的《公羊传》思想与口授其旨的公羊学思想,以了解公羊学传统;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进入经学家、春秋学家、公羊学家的历史视野去直面研究对象本身,获得对原初本真状态的真实了解。

一旦当代视野和历史视野获得了自觉,考量《公羊传》“以义解经”问题,首先就需探讨《春秋》经文及其作者、传者、性质、结构、功能、精神,进而重点比较三传解经的立场、动机、方法、原则、义理、目的等的差异,比如在学术(真、善、美)、治术(治己、治人)、

心术(安身立命、正身正心)总体追求的异同,又如三传解经在事、辞、义上的深浅、优劣、得失等等,最后直接专论《公羊传》“以义解经”诸问题,进行系统详细的考察。这意味着,当代研究者开始进入了原初传统。从原经《春秋》与原传《公羊传》来看,“以义解经”四字有三个关键词:“经”——“解”——“义”。“经”的研究就不能不考虑经学思维方式,“解”的探讨就不能不考虑经典解释理论和实践,“义”的阐发就不能不考虑政治伦理历史智慧。稍微思考“以义解经”,不难发现两种情况:一是“义”从“经”出,“我注六经”,尊重古传统;二是赋“经”以“义”,六经注我,凸显今时代。这样,“意义还原”与“意义再生”的解经目的差别就会自然存在。不管《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目的如何,本书研究主要是“我注六经”,尊重古传统。

事实上,任何一部经典都载事、修辞、寓义。其事,不管是“直书”还是“曲笔”,都必然反映作者所处的生活世界和历史世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经济状况、政治生活、文化观念、社会面貌等各个侧面,需要刨根问底。其辞,既然能成为经典,必然有其独特之处,需要反复体味。其义,“明言”与“隐言”留给解释者的空间大相径庭,需要区别对待。《公羊传》“以义解经”,重在“文”中探索“一字褒贬”的微言大义,经学思维方式、经典解释路径、政治伦理思想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正因此,小题大做,探讨《公羊传》“以义解经”也就更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古之学者求学治学,一为“求是”、“知道”,二为“修己”、“成人”,三为“变易”、“践行”,今之学者理当依旧。研究《公羊传》“以义解经”,但求能知《公羊传》“以义解经”之“是”之“道”,能领悟并继承优秀的孔子精神、春秋精神和公羊精神后提升自己,能效